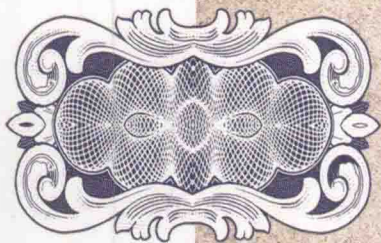


[日] 石川祯浩 著  
袁广泉 译

#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

*On Stage and Backstage: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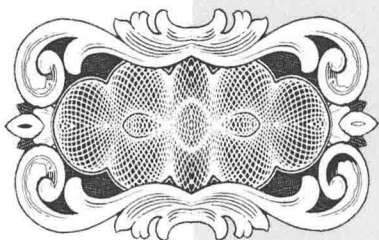
博  
雅  
史  
学  
论  
丛  
  
海  
外  
中

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史  
学  
论  
丛  
·  
海  
外  
中  
国  
史  
研  
究



#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

〔日〕石川禎浩 著  
袁广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569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9

(博雅史学论丛·海外中国史研究)

ISBN 978-7-301-25972-6

I. ①中… II. ①石…②袁…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5964号

书 名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
著作责任者	[日]石川祯浩 著 袁广泉 译
责任编辑	陈 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972-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a href="http://www.pup.cn">http://www.pup.cn</a>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a href="mailto:pkuwsz@126.com">pkuwsz@126.com</a>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定 价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25.5印张 343千字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52.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 中文版序

本书从我 1999 年以后发表的学术论文中,选录了适于中国读者阅读的 15 篇。我的研究工作,大体分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和中国共产党史两个领域,但研究态度无不重视具体事项、细节的考证,即所谓“上帝就在细节之中”。2006 年出版的拙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文版(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随处进行大量细节考证,部分中国学者因此评论“解剖麻雀般的细致分析”。此评难免为溢美之誉,然本书所收也多半为类似的考证文章。我的著作,因对狭窄专业领域考证细密,且事关中国近代史,所以在日本读者并不多。我期待在中国的众多学者和历史爱好者中或能得到更多读者。这是我应允出版该文集的初衷。

本书所收论文的另一特点是,相对强调中国曾经受到来自国外的影响。此点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样,也有部分中国学者评论说,石川的著作带有“外因决定论”倾向,过于看重来自日本及苏俄的作用。不同于上述“解剖麻雀般的细致分析”,所谓“外因决定论”是对著者的批评,因此还请允许我作一解释。我绝不认为来自日本等外国的影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许多地方指出日本的影响,也绝非强调日本比中国优越,或意指梁启超、李大钊等是以拾取、转述日语文献为能事的“买办”知识分子;而是感到在有关先进人物、革命家或革命运动的研究中,来自外国的影响往往被严重忽视,作为外国学者,发现有此问题而尝试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我的态度如此而已。

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指如下现象。清末至民国的中国知识分子阅读外国书籍、杂志,远较现在的学者为多。何以如此?因为

仅阅读汉语书籍而不利用外国书刊,既无法获得新知识,也无从了解世界,更难以摆脱传统思想的窠臼。要实现这些目的,明治日本可谓中国的“翻译”。这位“翻译”水准不俗,且使用汉字词汇,中国人对此甚感方便。不过,这位“翻译”毛病也不少,不好传达的地方就随意发挥,自己不懂的地方则略去不译。所以,当时如果想了解世界真相,当然需要自己掌握外语,以便直接阅读外国书刊。

这与现在依靠汉语书籍、杂志即可获得世界各地信息完全不同。正因如此,根据我的观察,我担心在汉语信息条件已十分完备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的近现代史学者,因整体上不熟悉外语而体会不到梁启超、李大钊等前人所处的知识环境。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现象,若不考虑日本和西方(也包括苏联及第三国际)的影响就无法解释;但中国史学界在研究李大钊、梁启超以及中共党史时,似乎过于轻视他们曾借助外语获取知识这一事实,以及当时来自外国的影响和外语原始史料。面对这种状况,我自认为作为外国学者或许能在这些方面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有所贡献。可以说,本书所收论文,归根结底皆出于这种想法。

有关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态度,或可加深我们对来自外国影响的理解。对于把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定义为“半殖民地”,虽然近来有一些学者开始持不同的意见,但大体上没有多少人有异议。所谓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通常的理解是,中国在经济、政治方面被迫从属于外国(列强)的利益。对于探讨这种对外从属性的研究,并无人批判其为“外因决定论”。然而,稍作思考即可知,近代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方面深受外国影响,唯独其文化、思想却得以幸免(或不存在对外依附),显然是不可能的。

把中国化作“半殖民地”的列强是怎样的国家?它们在想什么?要了解这些,唯有学习列强的语言,阅读外语书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若要寻求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的革命理论和“主义”,同样只能通过接近西方文化、学习其语言才能实现。这里存在着如下悖论,即必须借用帝国主义国家的语言来学习如何反抗

帝国主义。而试图打破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革命运动实践的某些结果,也并非都符合抵制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初衷。那就是,对共产国际这一国际革命组织的依附以及来自苏联的影响,曾在长时间内对中国革命运动形成束缚和桎梏。而这无疑是另一形态的“半殖民地”现象。

这些事例表明,中国的“半殖民地”社会性质,显然曾波及思想、文化、政治运动诸领域。正因如此,面对中国近代史,以更宽阔的视野,亦即从与世界性的思想流通、影响及运动相互关系的角度予以把握,这既是回归历史发生现场的研究方法,也有助于加深理解。

作为日本人而研究中国近代史,所采用方法应能发挥在日本从事研究的独特优势,自不待言。然而,如果作为外国人而仅追求标新立异,鸣中国学者所不鸣,中国读者恐怕至多感到一时新奇,认为“外国人的解释倒挺有趣”,而最终不会认可。我的愿望,或曰我二十多年来的目标是,在明确中国学者也不便解决的问题或不太了解的史实的基础上,与中国学者共同阐释中国近现代史的某些谜团,并力求达到同样的研究高度。本书是否实现了这一目标,还希望中国读者不吝批评和赐教。本书所收论文,有的发表在十多年前。因其间相关研究已获进展,或有新史料发掘和公布,当时的有些看法无疑需要修正。针对当时相关研究的评述,依据撰写学术论文的国际惯例,在当时虽属必需,现在看来却也无关紧要。对这些问题,要基于新史料、新见解全面改写,虽说并非不可能,做起来却不太现实。因此在收入本书时仅作最低限度修正,并在文末标注初次发表杂志处加以提示。此点还望读者谅解。

本书翻译,特意请拙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译者袁广泉先生担任。他是我供职神户大学时的学生,与我同岁;2007年至2012年曾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工作,与我同在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现为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他既对日语文章理解准确,也具有严谨、达意的汉语表述能力,更拥有中国近现代史的广博知识,是我最信赖的翻译家。有几篇论文,当初

曾借助其他译者之力,此次亦经袁先生全面检查、比对和订正,多处施以改译,并统一了体例和文体。故本书译者只作袁先生一人。

建议用“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作这部涉及多个领域和主题的论文集名称的,是当时作为编辑而提议出版本书的岳秀坤先生。没有他的提议,本书无从面世。对岳先生及接任岳先生承担本书编辑工作的陈甜女士致以诚挚谢意。另外,在论文执笔及资料收集过程中,许多中国学者都曾予以热情帮助。此处不能一一列举,但与他们共同进行研究,我从未感到因国家、体制不同而有丝毫交流上的隔阂,因而受到莫大鼓励,此处再次表示感谢。

我现在的研究,重点在中共党史,尤其是中共党史的资料编纂和研究体制、通史撰述的沿革,同时也在探讨毛泽东早期传记及其相关个人信息在国内和国外是如何形成和积累的。待研究有所积累,还望出版本书续编,以就教于中国读者。

石川祯浩

2015年盛夏

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 目 录

中文版序 / I

## 一 何谓中国

晚清“睡狮”形象探源 / 3

20 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

——排满、肖像、西方起源论 / 26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问题考 / 53

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 / 71

## 二 东瀛之风

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 / 95

近代东亚“文明圈”的成立及其共同语言

——以梁启超的“人种”为中心 / 115

梁启超与明治时期日本的地理学研究 / 129

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

——以茅原华山为例 / 146

## 三 国民革命

走进“信仰”的年代

——1922 年反基督教运动初探 / 167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终结与苏联和共产国际

——所谓“斯大林五月指示”问题 / 191



目  
录

走向农村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策略与  
共产国际/209

四 史实考据

早期共产国际大会的中国代表(1919—1922) /241

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

——从中共一大几份资料谈起/279

中共二大与中共党史研究史/300

孙中山致苏联政府遗书/329

参考文献/357

人名索引/386

事项索引/394

书名、刊名、著作索引/398

一  
何谓中国



# 晚清“睡狮”形象探源

## 一、序言

### ——缘起

2004年,梁启超研究不可或缺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日文版出版。<sup>〔1〕</sup>该日文版的最大特点有二,即在校订汉语原著基础上进行了准确翻译,并加了丰富的译注(共3940条)。历时十年而成的大量译注与书后人名索引及别名一览表,极大地提高了该书的利用价值。笔者也曾参与该书翻译,并承担了部分译注,但有几个问题最终没能解决。其中最大的问题与戊戌年(1898年)梁启超在北京举行的保国会上所作的演讲有关。

1898年4月21日(闰三月初一),保国会第二次会议于北京举行,梁启超在会上演讲,敦促中国士大夫奋起。他说:

嗟乎,昔曾惠敏作《中国先睡后醒论》,英人乌理西(英之子爵,今任全国陆军统帅)谓中国如佛兰金仙之怪物,纵之卧则安寝无为,警之觉则奋牙张爪,盖皆于吾中国有余望也。<sup>〔2〕</sup>

如果知道“乌理西”即吴士礼(Wolseley)、“佛兰金仙”即弗兰

---

〔1〕 丁文江、赵丰田编,岛田虔次编译《梁启超年谱长编》,共5卷,东京:岩波书店,2004年。

〔2〕 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111页。此处引用,依据《国闻报》第209号(1898年5月31日)、《知新报》第55册(1898年6月9日)就有关字句作了补正。

肯斯坦(Frankenstein),这段演讲翻译起来本来并不困难;但实际上却大费周折。问题在于译注。日文版译注就“曾惠敏”(即曾纪泽)、“乌理西”(即吴士礼)、“佛兰金仙之怪物”分别有如下注释:

【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近代中国著名早期外交家。离开欧洲外交舞台后的1887年1月,曾在伦敦的《亚洲季刊》(*Asiatic Quarterly Review*)上用英文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原题 *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表达了中国外交官的国际政治立场,引起了广泛瞩目。后该文经颜咏经口译、袁竹一笔述,收入《皇朝蓄艾文编》。该文以北洋海军的建设等军备现代化为中国觉醒的根据,主张强兵应先于富国,强化国势须从速充实外交。后来,持变法论立场的何启、胡礼垣认为曾的这个主张不彻底,并在其《曾论书后》(《新政真诠》)中予以强烈批判。

【吴士礼】(Garnet Joseph Wolseley, 1833—1913),英国军人。1857年初次来华执行军务,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战后主张援助清朝镇压太平军。后在英属非洲殖民地历任军政要职,1894年升任陆军元帅,翌年任英国陆军总司令。著有 *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in 1860* (Longman, 1862),该书记录了他在中国的经历。

【佛兰金仙之怪物】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创作的科幻小说中的人造人(Frankenstein,今译“弗兰肯斯坦”)。小说出版引发广泛热议是在1818年,因此,吴士礼以此比喻中国并不奇怪。梁启超是如何知道吴士礼的比喻的,不得而知;但他在1899年发表的《自由书·动物谈》(《饮冰室合集·专集》2,第43—44页)中提到,有一个叫“佛兰金仙”的人造怪物沉睡在大英博物馆,还说曾纪泽曾称其为“睡狮”或“先睡后醒之巨物”。但曾纪泽上述《中国先睡后醒论》

等文章里,并没有类似表述。<sup>[3]</sup>(下划线为笔者所加,下同)

笔者编写这段译注时最感困惑的是第3条。分条列目地解释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是由英国人雪莱创作的等并不难;问题在于,梁启超是如何知道吴士礼曾以此比喻中国的。还有,如上所述,梁启超在翌年即1899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不仅也有类似描述,而且将其与曾纪泽的言论(《中国先睡后醒论》)结合起来,说弗兰金仙之怪物就是“睡狮”。进一步探讨则隐约发现,我们熟知的近代中国的象征即“睡狮”这一表述(字句),其实最早就出现在梁启超1899年的这篇文章中。也就是说,“睡狮”“吴士礼”“弗兰金仙之怪物”之间似乎有着密切关联。

但是,在编写译注过程中,笔者最终没能搞清来龙去脉,只好暂作“梁启超是如何知道吴士礼的比喻的,不得而知”、关于“睡狮”以及“弗兰金仙之怪物”,曾纪泽的文章中“没有类似表述”。本来,日文版译注的目的正在于就此类模糊、暧昧的事项为专门研究提供信息,而并不在于对常见事项作一般性说明;因此,笔者一直认为上述注释语焉不详,未尽人意,试图得到更清晰的解答。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史学界有关象征性符号的研究取得进展,这几年围绕“睡狮”这一表述起源的研究日趋活跃。代表学者是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和单正平。<sup>[4]</sup>费约翰极力否定人们熟知的那句“中国(睡狮)醒来时,整个世界都会震撼”是出自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之口,说那纯属谣传。其主张大体如下:

[3] 《梁启超年谱长编》(日文版)第1卷,第379—380页。

[4]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中译本:李恭忠等译《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单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语境中的醒狮形象》(《南开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4期,收于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人民出版社,2006年)。

拿破仑谈论中国觉醒一事纯属谣传,没有任何的法文书面资料能够证明这句话是拿破仑说的。将它归功于拿破仑,未免剥夺了晚清官员们[指曾纪泽]的知识产权,正是他们,在19世纪末最早让世界注意到了中国的兴起。〔5〕

在此,费约翰强调,在19世纪大谈睡狮中国将要崛起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具体而言,就是从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开始的。

单正平则在其著作中单立一章,专门分析“睡狮”说的发生过程,并在涉猎众多资料后得出结论,强调曾纪泽和梁启超在其中的作用。他说:

“睡狮”说的发生过程可能就是:曾纪泽命名博物馆机器人为睡狮(姑妄信其有)、且在题画诗中对狮子的特征及其在中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有所提示——英国人将弗兰金仙的命名转述给日本人(?)——梁启超读日文报刊而知此说法——梁启超撰《动物谈》——黄遵宪、邹容等人继而援用。但这仅仅是推测,尚缺乏事实的依据。〔6〕

毋庸讳言,单氏的这项研究,其资料基础非常扎实,大大缩小了我们和真相的距离。但是,单氏自己也承认还缺乏决定性证据。总之,单氏的结论也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由于这几年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崛起,以及举办奥运会而激发爱国热情高涨,中国是“睡狮”这一话题近来重新升温,“睡狮”作为洗雪近百年屈辱的象征而再次引起人们热议。笔者也想借此机会来弥补编写译注时留下的缺憾。

## 二、探源之一

上述单氏的研究,无疑为我们探讨“睡狮”说起源提供了许多

〔5〕 费约翰《中文版序》,前引《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2—3页。

〔6〕 前引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第130页。就那句预言是否出自拿破仑之口,单氏认为费约翰之说理由并不充足,拿破仑有可能的确说过。

启发,但也留下了几个问题。主要有三点。①单氏称梁启超初次谈及弗兰肯斯坦(或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是发表于1899年的《自由书·动物谈》〔7〕,暗示可能存在来自日本的影响。但如本文序言所述,至迟在来日前即1898年4月21日在保国会上作演讲时,梁启超已在谈论弗兰肯斯坦和曾纪泽。②包括《中国先睡后醒论》在内,曾纪泽的文集中并没有“睡狮”“佛兰金仙”这样的字句。③同样,吴士礼的著作中,也没有把中国比作“睡狮”“弗兰肯斯坦”的语句。

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关键要弄清第一个问题,即梁启超在保国会所作演讲的内容来自何处。梁启超此前数年在上海购得《瀛寰志略》后“始知有五大洲各国”〔8〕,而这时却能够谈论吴士礼和弗兰肯斯坦,是因为他不久前读到了天津《国闻报》刊载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是王学廉译自英文的《如后患何》(译自英国《国运报》1898年1月1日),文章主张中国有可能觉醒并存在潜在威胁,文后附有严复的按语。〔9〕其部分内容节选如下:

我英现任陆师大元帅某君,曾于数年前论中国事谓:中国民众四百兆假天生拿破仑于其中,奋其才勇以为之君,振长策以鞭笞宇内,数年之后,欧洲之人将绝迹于亚东而太西种族将为所逼处。(严按语:所谓现任大元帅者盖乌理西子爵,其平居论中国之大可用同此。彼盖得于戈登也。)

中国既寤之后,则将为佛兰金仙之怪物。斯怪者任其卧则安寝无为,警之觉则大奋爪牙起为人害。……呜呼,佛兰金仙之怪物一机械之巧耳,知之则不足畏。若夫,中国物博人

〔7〕《清议报》第13号,1899年4月(收于《饮冰室合集·专集》2,中华书局,1989年)。下文引用《饮冰室合集》,仅记《文集》(或《专集》)及卷数、页码。

〔8〕梁启超《三十自述》(1902年),《文集》11,第16页。

〔9〕《国闻报》(天津)1898年3月22日。严复按语部分,今收于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78页。遗憾的是,据称刊登该译文原文的《国运报》的英文名称不详。



众,用西国之法以困西国之民,其将为欧洲之害,迥非金仙怪物所可比者,是则大可畏也。(严按语:佛兰金仙怪物者,傀儡也,见于英国秀谐理之小说,傅胶鞅革,挺筋骨以为人,机关枵触,则跳跃杀人,莫之敢当,惟纵其酣卧乃无事。论者以此方中国,盖亦谓吾内力甚大;欧之人所以能称雄宇内者,特以吾之尚睡未醒故耳。)

对该文中有关吴士礼和佛兰金仙的表述与梁启超在保国会上的演讲作一比较即可发现,梁在演讲中几乎原文引用了该文内容。而按语也表明,严复不愧为当时首屈一指的西学学者,对吴士礼的一贯主张<sup>[10]</sup>、小说《弗兰肯斯坦》的著者及其内容等,都有相当准确的把握。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将怪物弗兰肯斯坦的形状、印象准确地传达给中国读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读者在读了按语后会产生怎样的想象。唯一肯定的是,梁启超等想象中的怪物形象与我们现在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形象是有巨大区别的;而且,从他们将此形象投射到沉睡的中国身上这一点看,他们对这个怪物的理解似乎是正面的。

《国闻报》刊载的这篇译文和严复的按语,都没有涉及梁启超在保国会演讲时提到的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如后所述,当时关心时局的人,都已经比较熟悉曾纪泽的这篇文章。梁启超是把自己读过的曾纪泽的主张和《国闻报》刊载的译文巧妙地结

[10] 吴士礼曾多次说到,中国只要有拿破仑那样的人物出现,就会成为凌驾于西方各国之上的强国。例如,吴士礼自传(Wolseley, *The Story of a Soldier's Life*, Westminster: Archibald Constable & Co. Ltd., 1903)这样写道:“就人口方面而言,没有任何国家能与中国相比。在这个巨大帝国的任何角落,他们的习惯和生活方式都是相通的。在我看来,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他们将是世界上未来的伟大统治者。我一直这样认为,现在也这样想。中国只是没有彼得大帝或拿破仑那样的人物而已。”(vol. 2, p. 2)而通过译载西方杂志的文章,中国国内也对吴士礼的观点有所了解。请参阅《中国实情》(《时务报》第10册,1896年,译自上海《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1896年10月17日)、《论东方之害》(《外交报》第117期,1905年,译自《康顿白烈报》[*Contemporary Review*]1905年5月)。